

甚麼是保守？誰反對民主？

● 雷 頤

相對於80年代幾乎是「一邊倒」的狀況而言，由於種種原因（有思想性的內在理路，但更有非思想性的外在因素），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保守」之音空前強大。對此，已有許多人以各自的方式作過各種各樣的分析和評論，而《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以「中國九十年代保守思潮」作一專題評論，意義自然不菲。其中徐友漁、陳曉明和張靜等人的文章，對此作了雖不盡相同但大致準確的描述、概括和分析，使人獲益匪淺。而甘陽的〈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一文雖然洋洋灑灑被置於篇首，但卻恰恰是篇扭曲事實的「文不對題」之作。

所謂「保守」，是相對於既定狀況、秩序而言。一般地說，要保持、維護既定秩序或事物的原狀（這種維護當然包括想使已經發生某種程度變化的事物回到「原狀」的努力）便是「保守」；反之，要改變既定狀況、秩序，使事物的原狀發生變化的努力便可謂之「改革」，而要在短期內不惜以「非常之手段」使事物發生重大、甚至根本性變化的，便是「激進」或「革命」。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在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主張維持文革時期或文革前的諸種體制、反對否定文革和對這種經濟、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觀點，便是「保守」，反之便是「激進」；堅持「一大二公」、嚴格計劃經濟的觀點便是「保守」，主張「商品經濟」或現在所說「市場經濟」的便是「激進」（文革結束不久，就連「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這種觀點都曾被視為有某種「異端」色彩的「激進」。現在，此種觀點已被認為是頗為「保守」了。可見，所謂「保守」與「激進」總是相對於具體狀況而言）；堅持狹隘民族主義、要與「帝、修、反」「對着幹」、極力維持封閉狀態、反對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便是「保守」，主張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向外學習、引進外資的便是「激進」……這便是今日所說的中國的「保守」與「激進」的語境。離開這個語境來談論中國的「保守」與「激進」，必然會文不對題。

甘陽的〈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一文「失誤」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脫離了基本語境，而臆造了另外一個「保守」與「激進」，對

甘陽的〈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一文「失誤」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脫離了基本語境，而臆造了另外一個「保守」與「激進」，對「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作了全面歪曲，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誤讀」。

「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作了全面歪曲，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誤讀」。

例如，他強以自己側身其間的美國社會作為判定中國社會的「保守」的標準，認為中國的「保守主義經濟話語」是「以西方保守主義經濟思潮即經濟不干涉主義 (laissez faire) 為理論根據」的。也就是說，「自由經濟」理論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中國持這種理論也必定是「保守」的。甘文根本不顧這種理論在中國長期被批判、至今「私有化」仍難登「大雅之堂」這一事實。

甘文不止一次地談到中國知識界現在所謂「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和「民主」的對立，並認為「這種保守主義的基本形態往往表現為以自由主義之名貶低和否定民主」。甘陽甚至作出了「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由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為反對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眾參與越低，個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自由就越大」的論斷。這全然是有意歪曲。不錯，「消極自由」的觀念現在的確引起了中國知識界更多的注意和談論，但這更多地是針對中國知識界以往對此觀念注重不夠、了解不多而言。而且，並沒有人將這一觀念與「積極自由」和「民主觀念」對立起來，而是強調兩者之間的互相補充，互為依賴。在這一觀念的引進過程中，甘陽八年前所寫的〈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一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①。該文雖然不長，卻提醒了中國知識界注意到這一為其忽略已久的重要概念，使其對「自由」、「民主」的理解較前更為全面、深刻，意義不容小覷。而且，甘陽此文也是從補充「闕失」這一角度來闡發的，並未將

「消極」與「積極」對立起來，也沒有（現在的中國知識界仍然沒有）「以自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至於其〈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一文^②，的確「保守」得可以，但該文在大陸知識界的影響實在有限，姑且不說能讀到該文的人本就不多，就是讀到該文的人，大都對此深表不滿和堅決反對，同時對他的觀點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大（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變化驚詫不已。甘陽的這篇文章倒的確是「以自由反民主」，但這只是他個人的觀點（也可說是思想的誤區），有必要再次強調，大陸知識界對此是強烈反對的。如果說甘陽現在只是對自己個人的「失誤」作一番檢討和反省，不僅無可非議，而且值得歡迎。但可笑的是他把自己的「失誤」誇大成「中國知識界」的失誤，我願意相信這僅僅是由於他對「中國知識界」的現狀了解不夠所致。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價值，一直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所堅持的。卞悟的〈公正至上論〉、〈起點平等如何可能——再論公正至上〉、〈公正、價值理性與反腐敗——三論公正至上〉、〈公正為道德之基——四論公正至上〉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作^③。對此，甘陽毫不理會，並進一步歪曲說：「中國知識份子幾乎普遍地擔心，在中國強調民主只怕又會弄成『大民主』，強調『參與』又如何避免不弄成『群眾運動』？」事實是，恰恰是在對那種以「大民主」、「群眾運動」之名行專制之實的文革有着切身的體驗之後，中國知識份子才更強調和呼籲民主、民主精神和制度化的民主。至於現在對民主的談論相對（只是相對）減少，主要則是一種非思想性的外在因素所致。對此，甘陽想來還不至於健忘吧？看來，「站着

甘陽〈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一文的确「保守」得可以，的確是「以自由反民主」，但這只是他個人的觀點，大陸知識界對此是強烈反對的。可笑的是他把自己的「失誤」誇大成「中國知識界」的失誤。

說話不腰痛」雖是一句俗語，但還確有所指。這也說明，甘陽所謂的「民主」，其實就是他與崔之元等近來所宣揚的文革式的高度專政。

在對「保守主義文化話語」的概括中，甘陽認為「時人大多傾向於貶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傳統」。「大多」的估計是否準確可以姑且不論，但相對於80年代，強調「五四」負面影響的論述的確猛增。就維護「五四」精神或「五四」傳統而言，筆者倒與甘陽一致，並多次撰文為「五四」的一代辯護。但問題在於甘陽的進一步論述：否定「五四」的「這種文化保守主義同時也發展為對當代西方思想學術的基本態度，即認為今天不應該再重複五四傳統一味追隨西方激進思潮的同樣錯誤，例如『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等就不適合今日中國的需要……」這種無視基本事實的概述令人震驚。只要對90年代中國思想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者和「後殖民論者」與「前現代」「傳統論」者幾乎是同時對「五四」作了激烈的否定。

為避免斷章取義，恕我較為完整地引述中國「後學」的有關論述。《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和1994年2月號分別發表的鄭敏的〈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的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商榷之商榷〉兩文，正是用拉康 (Jacques Lacan) 和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的理論來論證「五四」白話文運動「急躁」、「偏見」、「形而上」、「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否定繼承」、「自絕於古典」，所以成就不高。張頤武在《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3期發表的〈「現代性」終結〉一文寫道：「從『現代性』這一概念的產生過程和發展來看，它是在西方文化中出現的，以

西方的啟蒙主義的價值觀為中心建構的一整套知識／權力話語。對於非西方的社會和民族來說，『現代性』是和殖民化的進程相聯繫的概念。」「對於中國語境而言，『現代性』意味着以西方話語為參照的『啟蒙』與『救亡』的工程。這一工程始於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古典性』的崩潰所造成的『主體』移心的焦慮。」「『現代性』的中國化乃是如何重建中國的『主體』的探索。它生產了有關西方／中國的一整套『知識』，試圖通過這套『知識』使得中國的世界位置得以確立。」「這種知識必須以西方話語作為唯一的參照系。西方的文明隨着殖民進程而來的全球化被中國的知識份子視為走向未來的唯一選擇。因此，西方乃是無可爭議的『主體』，它的文化的巨大的物質與精神力量被視為最為進步的，它的創造力和想像力被認為得到了最為充分的發揮。」「這裏有一個明顯的文化等級制，西方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中國已自居於『他者』位置，處於邊緣。中國的知識份子由於民族及個人身分危機的巨大衝擊，已從『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話語中擺脫出來，經歷了巨大的『知識』轉換（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整個過程可以被視為這一轉換的過程，而『五·四』則可以被看作這一轉換的完成），開始以西方式的『主體』的『視點』來觀看和審視中國。這也就經歷了一個將西方視點『內在化』的過程。……這個將自己處身其中的『文化』他者化的過程，正是中國『現代性』的最為重要的表徵。」新式知識份子「被一套西方的話語所命名和書寫」，「以西方式的能指指認一個本土的所指」。「這種『他者化』可以說是貫穿於整個『現代性』和『知識』生產之中。這種生產的典型方式是通過中西

中國知識份子現在對民主的談論相對（只是相對）減少，主要是一種非思想性的外在因素所致。對此，甘陽想來還不至於健忘吧？這也說明，他所謂的「民主」，其實就是他與崔之元等近來所宣揚的文革式的高度專政。

甘陽在文章中堅定地表示「拒絕以中國傳統之名否定西方啟蒙以來以及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性傳統」，但對於「中國後學」以「後現代」之名來否定這個傳統，不知甘陽是依然「拒絕」抑或欣然「接受」？請給出一個態度來。

比較提供一種有關中國人文化特徵的『他性』話語，提供一種有關中國的認識的方式。」因此，「陳獨秀通過一系列二元對立的編碼，以西方的視點將東方的文化和社會作為一種次等的文化。……陳獨秀以一種普遍的世界主義式的西方價值將中國『他者化』了。」引入西方話語的這一策略是引入「一個西方式的有關『普遍人性』的神話。從這個『普遍人性』的觀念來看，西方的啟蒙主義話語所建構的有關『人』的偉大敘事是衡量一切國家與民族的絕對化的標準。從魯迅對『真的人』的呼喚到八十年代有關『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及『主體論』的理論思考無不無條件地認同於這一普遍人性的價值觀。」他在文章結尾提出「有關『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新知識的出現以及『冷戰後』多極世界格局的出現，使得『現代性』本身的反思與批判成為當下文化的基本前提。……『他者化』的自我定位也在多元文化的潮流中受到了有力的批判。『現代性』的神話已被『解構』」。張寬在《讀書》1993年第9期、1994年第10期介紹薩伊德(Edward Said)和「東方主義」的文章，實際上也用「後殖民」理論來否定「五四」，並把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與「東方主義」相提並論。他在《天涯》1996年第2期發表的〈文化新殖民的可能〉一文，在得出了「德國法西斯對猶太民族施下的惡行，乃是啟蒙話語邏輯發展的必然」這一結論後便明確寫道：「中國的五四運動，大體上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橫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經指出過的，西方的啟蒙話語中同時包含了殖民話語。而五四那一代學者對西方的殖民話語，完全掉以了輕心，很多人在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受了殖民

話語，因而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採了粗暴不公正簡單否定態度。」

對上引種種說法，筆者戲稱為「五四精神」實際處於「前」「後」夾擊之中，二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正是這些「後學家」，對於甘陽先生頗為贊同(筆者也非常贊同)的80年代的「激進」作出了非常強烈的指責，對「八十年代中晚的『文化反思』中，有人罵翻了自己的祖宗八代」(張寬語)大表憤怒，認為那是「在『啟蒙』話語中沉緬的知識份子對西方話語無條件的『臣屬』位置和對於『現代性』的狂熱迷戀」(張頤武語)。有關討論已經很多，僅《二十一世紀》就發表了不少有關文章，甘陽為何都視若無睹？無視這些還想勾劃「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真是勉為其難了。甘陽在文章中堅定地表示「更拒絕以中國傳統之名否定西方啟蒙以來以及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性傳統」，儘管筆者對甘陽的這一觀點完全贊同，但還是想追問一句：那麼，對上述那種以「後現代」之名否定西方啟蒙以來以及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性傳統，不知甘陽是依然「拒絕」抑或欣然「接受」？請給出一個態度來。

甘陽力主的「民主的自由主義」也是筆者所贊同的，而正是中國的「後學」既反「民主」也反「自由」，張頤武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上的多篇文章都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進行了否定，張寬也說道：「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獨立性等等概念已經講了多年，但關鍵在於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要有區別，而不能無條件地擁抱這一連串的資本主義觀念……我們今天思考問題似乎不應停留在80年代，而需要更進一步。」^④可見，「西方激進思潮」在中國的語境中完全可以變

成一種「保守思潮」，所以絕不能想當然（但願僅僅是「想當然」）就把「西方的「激進」當成中國的「激進」，把西方的「保守」當成中國的「保守」。筆者多次從維護啟蒙、現代性、「五四」、民主、自由、「朝氣蓬勃的80年代」這一角度出發，對上述中國的「後學」作出批評，指出他們把一種原本是「激進」的學說變成「保守」的，並多次強調引述一種學理時一定不能忽視具體的背景，否則就會「出洋相」。如果甘陽真是反對「保守」，要維護啟蒙、民主、現代性……那就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請跟我來」——也對上述中國的「後學」理論作一番分析和批評，而不要像與風車作戰那樣反指對「中國後學」的批評為「保守」。

另外，與對「五四」和80年代的否定緊相聯繫的是一種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流行，無論贊同與否，都不能不承認這是「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的一個非常重要部分，它甚至可說是與「8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相區別的一個標誌。不知甘陽在勾劃「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時為何對如此重要的社會思潮卻不提一句、不置一辭。如果是有意不提，那麼他的「景觀」便是嚴重歪曲的；如果是確實不知，那麼他的「景觀」便是非常殘缺不全的。而且，更不知甘陽對這一思潮作何判斷？如果認為它是「保守」的，那麼它是比甘陽所概括的「保守主義理論話語」、「保守主義歷史話語」、「保守主義文化話語」、「保守主義政治話語」、「保守主義經濟話語」這五個「話語」都要強勁得多的一個「話語」，因此首先應對這個「話語」作出批評；如果認為它是「激進」的，那麼甘陽對「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所作的「大體是從80年代末開始批判激進主

義思潮出發，日益走向保守主義甚至極端保守主義」的概括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現在唯此「話語」為大，那就應該得出「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是「日益走向激進（民族）主義甚至極端激進（民族）主義」的結論。二者之間，不知道甘陽更願意選擇哪一個？請不吝賜教。

由於甘陽對「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作了一幅既殘缺不全又嚴重扭曲的概括勾劃，並完全以一種學說在西方語境中的「激進」、「保守」作為其在中國語境中的「激進」、「保守」的標準，所以該文後面的長篇大論無論顯示出多強的「學理」，相對於這一論題來說就不能不流於泛論，文不對題。至於甘陽為何會如此嚴重地扭曲事實、以偏概全，則不屬本文範圍。只要指出一些基本事實，就完成了本文的任務。

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流行，是「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的一個非常重要部分，它甚至可說是與「8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相區別的一個標誌，但不知甘陽為何對如此重要的社會思潮卻不提一句、不置一辭。

註釋

- ① 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讀書》，1989年5月號。
- ② 甘陽：〈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1年2月號。
- ③ 以上四文見《東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6期；1996年第5期。
- ④ 張寬：〈加強對西方主流話語的批判〉，《作家報》，1995年6月24日。

雷頤 1956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副主編、副編審。